

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20 世纪上半叶 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

李书豪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限，进而提出“边疆性”与“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关键词：20 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民族史；边疆性；边疆史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5639 (2022) 01 - 0046 - 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2.01.008

The Integration of “Frontier Nature” and “Nationality”: Reflection of the Survey of Southwest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 Shuhao

(School of Law and Sociolog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For the survey of southwest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limited to the scholarly single-dimensional research of ethnic historiography or national frontier studie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generate southwest surveys. By comb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results of the southwest survey, and studying deeply into the various discusses respectively in ethnic historiography or national frontier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vision limitations of the single research path of ethnic historiography or national frontier studies from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southwest”. The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key role of the integration of “frontier nature” and “nationality” playing in the survey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us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urvey of southwest China; ethnic historiography; frontier nature; frontier historiography

一、引言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边患危机日益严重等原因，诸多国内学者、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团、高校学术团体等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多次调查，出现了以西南地区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热潮，并形成了数百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些成果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民

族问题、边疆政策等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调查”^①展开讨论，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西南调查中某一主体或某一区域的调查历史概述、学术意义评定，以及背景和成因等方面；研究多偏重于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史、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阐述，仅将西南调查作为陪衬或背景，用以说明前述

收稿日期：2021 - 11 - 20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 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民族调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YB2020070）。

作者简介：李书豪（1997—），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社会史研究。

① “西南调查”，指西南调查活动本身，或者其成果集成。文中简称为“西南调查”（笔者注）。

学科中的某一重要问题，而对西南调查本身进行深入研讨的任务便只得旁落一边。虽然西南调查本身就是历史的问题，但也如葛兆光所言，“各种历史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1]，这使得上述研究者未能跳出自身的史观与学术背景来审视西南调查，无法专注于西南调查本身，而破除现有研究瓶颈的关键恰恰就在于此。我们需要将视野拉回并聚焦于西南边疆与西南各民族，对西南调查本身加以深描，真正挖掘出西南调查的核心与起点，对其蕴含的边疆性与民族性进行整合与融通，如此将会使有关西南调查的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

“西南最明显的特征有二，这就是边疆和民族”^[2]，而西南调查也同样与边疆、民族交融在一起，成为我们认识西南调查的先决条件与路径规划。从民族史角度而言，西南各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我们无从否认西南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身份的自我形塑，更无从否认各民族具有象征性的仪式、系谱与历史叙事等；从边疆史来看，“西南”具有明显的地理含义，在历代史书与史家观念中其也被明确归为边疆地区，加之“边疆”一词近百年的形塑，不仅成了“标识中国兴衰命运的一个‘关键词’”^[3]，更成为理解“西南”的出发点。因此，边疆史与民族史的接轨与互鉴应当成为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的必然路径。本文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更是要在扬弃二者分析局限的同时进行再探讨，以期能够开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

二、三种取向、两种立场

什么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扩宽视野，更意味着如何将西南调查还原到其历史实景当中，并将其作为问题认识的主位进行把握。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以新的视野看待西南调查，这是本文必须明确回答且至关重要的一点。要说清这一点，则免不了要对以往研究做出回顾与反思，进而得出可能超越以往的启发。

国内学者中，从丁文江关于西南地质兼部分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开始，以及杨成志、凌纯声、陶云逵、方国瑜、林耀华等人纷纷进入西南地区开展民族调查，边疆民族调查逐渐在当时的西南调查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西迁重

庆，众多高校退守大后方，诸多学者云集西南，西南联大、魁阁研究工作站的出现使得西南边疆研究盛极一时，同时也迎来了西南调查的巅峰时期。按照学界的认识，中国边疆研究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为清代道咸年间西北史地学，第二次则是20世纪20~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和发展，二者均“应时局之变而起，又因时局之变而止”^[4]，但西北史地却并未淡出后世学者的视线，有关前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乃至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相较之下，西南调查直至进入21世纪才得到关注，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国内学界有关西南调查的现有成果可归结于资料搜集整理、调查过程叙事与学科史总结三种取向。从资料搜集整理来看，根据不同的调查主体将西南调查分为外国人士、官方调查团、国内学者与高校团体三大类别。此工作主要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5-6]、马玉华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7]、王晓莉和贾仲益主编《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8]为代表，这三套集成收录了大量的原始文本，其内容涉及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至于西南调查的具体过程与调查内容，在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9]、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10]、白兴发《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11]等著作中有非常细致的呈现。本文不再赘述。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学科史的总结与探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王建民^[12]、王水乔^[13]、龙平平^[14]、胡鸿保^[15]等均对西南调查做出过梳理与反思。仅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而言，能够像西南调查这般有着足以左右学科历史发展的学术活动似乎并不多见。这些调查活动奠定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生发的基石，是民族学早期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为此后的田野调查拟定了基本规则，为后世科学、详细的西南民族研究开创先河。就此而言，学界对西南调查的学科史地位与意义已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虽不能说是毫无异议，但大体已备，现有评价并无推翻的可能，对西南调查进行深入研究也得益于上述认知。后世学人一方面可以借西南调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边疆和民族观念转变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亦可理解现代学术与时

势政局的相互关系,从而为解决当代中国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提供借鉴。

关于西南调查的论著日益增多,这实为一件幸事,可是究竟该以何种理念为参照,从何种路径出发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不同研究者所持观点相差较大。从学科立场来看,可明显划分出边疆史、民族史两种,二者的研究对象虽是一致,但因路径与取向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工。

从边疆史视角出发看待西南调查的成果为数众多,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惯于借用西南调查来反映清末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焦点与成因,其着眼点并不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而是集中于边疆治理史、边疆政治史、边疆机构沿革史等问题,既“无法把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历史学、地理学中提升出来”^[16],又放弃了在民族史领域中开拓新研究的可能。

吴文藻先生曾在《边政学发凡》中指出,“中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实”^{[17]7}。无法否认,英、法在西南边疆的侵夺以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对西南各民族有着巨大影响,但却不能因此忽视西南多民族长期共存、共生的民族融合进程。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西南各民族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身份界定,在英、法帝国的势力争夺中努力表述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并在国民政府构建的民族谱系中极力确认自己的民族地位,在“大多数人相信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一个大民族国家”^{[17]5}的情境下,西南调查进而“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18],使其最终成了有关西南历史诠释与民族身份表述叠合的复合体。正因如此,对边疆史、民族史二者的视野与方法进行结合,既是西南调查复杂性的需要,更是其内在的学理呼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跳出边疆史的束缚与学科史的阐述。马玉华从国民政府官方调查的结果入手,对云南、贵州、四川及西康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土司、人口、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对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与民族政策做出总结性评价^[19-20],其论著可算是有关国民政府西南调查进行集中探讨的成果。黄兴涛、夏明方主编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21]一书收录了胡鸿保、林超民、王建民等多位学者从现

代性、民族国家出发,重新思考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其视野极具借鉴性。朱映占的系列论文主要着眼于民族与国家建构的层面,对西南调查与民国时期国族建构、民国学人西南调查与研究焦点问题等方面做出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启发意义^[22-24]。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八章“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分析了此次调查对于认识西南边疆民族、西南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是尝试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5]。

从民族史角度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也并非创新之举,而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从学术脉络来看,与此前相较民国学人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方法发生了极大转变,依靠田野调查来反哺历史文献已然成为民族史研究另一并行不悖的路径,但当代学者多埋首于古代文献,对西南调查所得文本并无太大兴趣,最终呈现出“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26]的景象。

若从民族史“求通”的学科诉求来看,民族史的书写必须联通民族的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的发展,如此才能更为完整地呈现出西南民族的融合路径与历史图景。当涉及近代民族史的探讨时,西南调查无疑是最好的史料补充与例证,但却未能引起民族史学人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仍在于研究方法的陈旧与视野的固守^[27]。除正史、志书等传统史料外,西南调查文本或称之为历史民族志完全可以奠定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史料根基。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的西南民族史“出现了多学科合作进行的局面,特别是‘民国以来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28]。虽然这时的调查主要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范围,但“它们与民族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但因为这些成果本身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不少作者往往也能结合历史文献,做一些西南民族史方面的探讨”^[29]。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已有成果,还是从学科的理念与路径来看,从民族史视角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而用太过传统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史,只能是牺牲了大量学术问题,而陷于固守于古代民族范围的学术窘境。

总之,相较于西南调查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

现有成果可谓势单力薄。在继承前辈学人研究基础上可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调查，或者说，应从怎样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不同的视角所对应的解释路径在历史上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证明？这不仅涉及我们对西南调查的定义与解释，更涉及民国时期的西南调查是如何影响到更深层的国家、民族、边疆等历史观念的。

与王朝秩序下的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不同，从事西南调查的学者与团体开始通过“自身的调查与研究来探寻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后续的世界之变中可能获取的新地位与新未来”^{[30]73}，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命运的双重关注构成了西南调查的时代基调与思想基础。正因如此，西南调查才成为后世研究绕不开的高峰，激发我们频频回首与其保持长久的对话。提出针对西南调查研究的新可能，并不是为了重新书写历史，而是借此接通民国学人边疆史、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以宽阔的视野重新看待西南调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近代以来边疆形成中的历史贡献。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西南调查研究的核心问题，转向西南调查的历史现场，再现西南调查的“关键词”与思考要点。

三、“边疆”与“民族”：西南调查的二维切入

20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社会变革、学术更新等多种内外因素缠绕交互、同频共振的结果，对近代中华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历史地位。无论西南调查的兴起成因、具体过程、文本叙事等如何复杂，其与边疆、民族的本质联系是断不可忘记的，这是理解西南调查的根本所在。基于此，西南调查的研究既要考虑到西南边疆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更要考虑到西南诸民族在这一时期对自身的塑造与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和主动依附，只有将西南边疆史、西南民族史作为衡量标尺与考察本位，以西南为中心来重新讲述西南调查，才能为其研究打开新的方向。

（一）跳出“大历史”，从边疆出发

对西南调查的研究，首先需要在整体的中国史中确定我们的思考路线、研究立场和史学观念，恰如吴楚克所提醒的，“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

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31]。

这种“大历史”的预设态度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但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解若不能基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灵活运用，却也可能有碍于我们研究西南调查。因此我们也要注意，不能以中国史的宏观性去消解边疆史的特殊性，这无疑会纠缠于宏观中国史的视野中，无法真正进入西南，更无法将西南作为西南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当把西南作为思考与研究的起点，便会发现西南调查研究的薄弱并不是因为研究问题的稀缺，更不是因为文本匮乏，而是我们的视野受限于“中国整体”的叙述框架，没有意识到西南作为与中国整体相对的部分、边疆之存在。站在整体的中国史立场来说，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强势闯入、强行开口通商使得东南沿海的社会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剧烈的，但当我们把内陆的西南边疆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似乎感到近代以来的海疆冲击弱于、晚于列强在西南、西北内陆的介入与割裂。西南边疆危机并非只是一个特例，而是发生在整个近代中国的边疆之中，其危机内部不仅有着清代以来统一多民族王朝内部边疆问题的持续升级，更包含着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中所遭遇的挫折。在此意义上，可以反思的是，以往视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南调查？倘若把西南边疆作为中心来思考，西南调查的研究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无法否认，西南调查的成因部分来源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华侵吞所引发的边疆危机。这一分析虽无事实性错误，却有着概论式的偏颇认识。西南调查的研究要想真正突破以往解释框架，则必须在坚持历史宏观叙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西南边疆自身来重新思考。强调西南调查的边疆特性，并不是说诸如鸦片战争此类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无足轻重，更不是要刻意制造出与中国史相对立的边疆史，而是说我们的思考起点应该是西南边疆，或者将边疆性作为西南调查的一个既定前提。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边疆处于国家的次要地位，二是无法大尺度观察边疆现象”^[32]。而人们很容易将国家史作为西南调查的参照系，从而使得其边疆性也就无法特别清晰地裸露出来，这便是为什么以往研究无法把关注点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南调查进行讨论时，要以

西南边疆史为标尺,其目的在于将西南调查还原到其自身所处的历史局势中去,结合西南边疆自身内在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西南的边疆特性重新看待西南调查,揭示出以往被宏大叙事所压抑的诸多方面,使西南调查获得更具纵深性的研究视野。这不仅能够为理解西南调查提供新的角度,更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把西南地区放置于“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与分析的模式。如此,我们才可能会更深入地审视西南调查的历史过程,从而描绘出另一种更接近真实的历史面相。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边疆史必然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缺少中国史关照的边疆史也无法称为中国之“边疆史”。我们强调注重边疆特性,并非对于中国史的拒绝,而是表明“涉及边疆问题时,不应忽视从边疆本位的视角进行思索”^{[33]24}的学术探究倾向。

(二) 以西南民族为考察本位

胡涤非曾指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外遭受着外敌入侵,主权受到威胁等困境;对内面临着进行全面社会变革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往往是重叠进行的,并不能截然分开”^[34]。在此,将西南民族作为考察本位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而且承接民国学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我人今日之边疆的边疆问题,是在以‘人’的问题来处理‘地’的问题,换言之,必得就‘边民’问题来探讨‘边地’问题”^[35]。后者虽带着较为明显的边政学色彩,但已然表明出边疆问题实为民族之问题。尽管两位学人所处时代与讨论细节各不相同,却均持有同样的中心论点:民族与边疆是并列存在,忽视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完整的语境。

如若单纯从边疆史的视野出发,不免会忽视西南民族的存在,遮蔽了西南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进程,将西南民族共通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其对中华民族自觉的认同与归附放置一旁。只有在边疆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约束中,“揭示其中的地域间关联及其背后的群体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边疆逐步汇聚成中国的历史过程”^{[30]79}如此,才能够达成民族与边疆二者的整合性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到20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中各主体为西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书写

历史的自觉责任。可以说,西南调查正是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与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边疆时局互动的产物。对于西南调查的分析要突破单一路径的研究偏好,就要认识到来自西南民族自身内部的主动塑造。

从西南民族的视角出发并非要否定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是要从西南民族的历史中重新看待这一时期,突出西南主体的叙事逻辑,并对西南调查做出解释。在此意义上,西南调查并不仅是在“舶来”学科与边疆问题刺激下所催生的被动产物,而是在时势要求下,西南民族和学者主动选择与合力构建的成果。这不仅显示着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更符合西南各民族愈加紧密地汇聚到中华民族中来这一历史理路。

以往的学科史研究似乎太过于强调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思想的传入,这种解读不仅限制了人们对西南调查更为深刻的阐发,更是容易人为地设下思维陷阱。我们不能将西南调查仅推究为边疆认识的积累与专业化趋势的建构,要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民族调查其实是“晚清、民国时期统治阶层,知识精英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对边疆问题思考与实践积累之结果”^{[33]63},更要看到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西南边疆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动态过程,在更为宽阔的历史维度中探讨西南民族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承接相继之关系。

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借助于西南民族的考察主位是要将当时学者与民众所追索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心声再次生发出来。我们不能仅将西南调查看作为国民政府边政治理提供支撑的学术实践,而是要看到从事调查的学人志士试图通过学术挽救民族危机与西南边疆危机的努力。但是,单以“学术救国”对此问题进行概括未能尽意;西南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主动依附与西南调查对于西南各民族“中华民族意识”的塑造是西南调查中潜在的暗线。西南调查研究的深层目的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把握住西南边疆自身的脉搏,更要将这条暗线从历史深处拉出,以此展现西南近代边疆民族更为深层的情感体验与民族意识。

我们只有借助于西南民族的本位视角,“逆着纹路来梳理历史”^[36]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样不但能够丰富我们对西南调查在学科史中地位与意义的

认知,而且能更好地认识到西南调查在近现代民族史上,对西南各民族走向自觉、共生之整体的推动作用,乃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价值与贡献所在。

四、结语

在前文梳理西南调查的成果时,不难发现,民族史对民族主体性的强调与边疆史的政治性说明,都不同程度地将西南调查内在的民族性与边疆性的双重特性进行了剥离。无论是基于边疆史,还是民族史的单独立断,二者都无意地抽离了西南民族的主体意识或是西南边疆的历史传统,使得最终的结果都带有某种偏好,沿二者中无论哪一路径深入下去,可能最终得到的仅是西南调查的某一部分,整体性叙事与解读仍未形成。

事实上,无论对西南调查做出怎样的解读,归根到底均是在边疆与民族的基础上界定的,脱离二者西南调查也就无从谈起。若要实现对于西南调查研究的新的可能,就要放弃非此即彼的站队式研究,将西南调查的边疆性与民族性统合起来,要看到民族与边疆是作为整体出现的。这一方面来源于西南民族自身的内在意志,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西南边疆的政治、社会等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密不可分。西南调查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基于西南边疆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等内容上,确立西南各民族对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知与塑造,西南调查最终要“回到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进而形成一个更具整体性的中国的知识图景”^[37],并为理解当今之西南提供历史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葛兆光. 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论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96.
- [2] 何明. 从殖民主义、民族危机到民族国家重建、文化自观: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序言 [M] // 何明.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6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7.
- [3] 袁剑. 边疆概念的抽象化与具体化: 民族志书写与近代的相关尝试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6 (4): 40-47.
- [4] 封磊. 时局·边疆·学术·学人: 互动中的嬗变 以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为中心 [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3 (4): 76-84.
- [5] 李文海,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少数民族卷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
- [6] 李文海,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 [7] 马玉华.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初编): 西南边疆卷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
- [8] 王晓莉, 贾仲益. 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9] 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 (1903~1949)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167-256.
- [10] 聂蒲生. 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 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 [11] 白兴发.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 [12] 王建民.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12): 1-13.
- [13] 王水乔. 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 [J]. 云南社会科学, 1994 (4): 72-77.
- [14] 龙平平. 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 [J]. 思想战线, 1986 (5): 77-82.
- [15] 胡鸿保, 张丽梅. 20 世纪早期外国民族学家在华调查对中国民族学建设的影响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8, 29 (12): 42-45.
- [16] 吴楚克. 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0 (4): 54-58.
- [17] 吴文藻. 边政学发凡 [J]. 边政公论, 1942, 1 (5-6): 4-14.
- [18] 发刊辞 [J]. 西南边疆, 1938 (创刊号): 1.
- [19] 马玉华.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20] 马玉华. 20 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15 (1): 105-113.
- [21] 黄兴涛, 夏明方.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 [22] 朱映占. 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8 (2): 121-126.

(下转第 59 页)

- [18] 葛洪. 肘后备急方校注 [M]. 陶弘景, 补缺. 杨用道, 附广. 沈澍农, 校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 [19] 丹波康赖. 医心方校释 [M]. 沈澍农,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 [20]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M]. 李景荣, 校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 [21] 廖育群. 记载与诠释: 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 [J]. (台北)新史学, 2001, 12 (4): 121-153.
- [22] 王焘. 外台秘要方 [M]. 高文铸,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336.
- [23] 隋志仁. 英汉营养科学词典 [M]. 北京: 中国食品出版社, 1989: 64.
- [24] 南京中医学院. 诸病源候论校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0: 440-441.
- [25] 酈道元. 水经注校证 [M]. 陈桥驿,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95.
- [26] 游修龄, 曾雄生. 中国稻作文化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7-43.
- [27] 谭仲池. 长沙通史·古代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 [2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县文物管理所. 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 [J]. 文物, 1990 (8): 17-30.
- [29]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090.
- [30] 段成式. 酉阳杂俎校笺 [M]. 许逸民, 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459.
- [31] 侯旭东. 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 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 [J]. 历史研究, 2010, 50 (5): 4-26.
- [3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M]. 释文修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2-43.
- [33] 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305.
- [34] 孙诒让. 墨子间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485.
- [3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6]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666.
- [37] 中国农林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74-82.
- [38]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99.
- [39]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 [40]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

(上接第51页)

- [23] 朱映占. 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南民族情况概要 [J]. 文山学院学报, 2013, 26 (4): 47-51.
- [24] 朱映占.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J]. 思想战线, 2014, 40 (6): 35-43.
- [25] 王文光, 朱映占, 赵永忠.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 [26] 龙晓燕, 王文光.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思想战线, 2003, 29 (1): 103-108.
- [27] 王文光, 朱映占. 继承与突破: 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景及其可能 [M] //何明.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25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8.
- [28] 王文光, 朱映占.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运用评述 [J]. 思想战线, 2009, 35 (2): 31-36.
- [29] 粟品孝. 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与发展 [C] //2013年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6-94.
- [30] 袁剑. 整体感与中国性: 20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 (2): 70-81.
- [31] 吴楚克, 马欣. 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J]. 思想战线, 2019, 45 (2): 50-56.
- [32] 杨明洪. 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 68-74.
- [33] 段金生. 学术与时势: 民国的边疆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34] 胡涤非. 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民族主义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37.
- [35] 胡耐安. 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 [J]. 边政公论, 1944, 3 (1): 21-30.
- [36] 杨俊杰.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辩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9.
- [37] 袁剑. 何以为边: 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1 (1): 1-7.